

七大前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两次讲话

1945年2月15日，就在七大召开两个月前，毛泽东专门来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专门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了报告。在七大召开前的不到半年时间内，毛泽东为什么两次到中央党校讲话呢？他说：很快我们党要召开七大了，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客观条件有了胜利的可能，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

□ 倪德刚

集中统一、思想和行动一致是根本之道

集中统一、思想和行动一致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并不断创造奇迹的根本之道。毛泽东说，为什么说在组织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

坏人混进党里、不纯洁分子混进党里，我们必须进行清理，这是我们党从严治党的传统。毛泽东讲，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忘记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他说，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整风运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对党校学员说，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标准的党。

办党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纯洁

办好党校就要有一致的意见和标准。毛泽东说，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中央党校，现在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学习。要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统一的思想，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否

则，有人要学经济学，有人要学哲学，有人想看小说，有人想学外国文，那么，我们的学校就不好办，也办不好。我们全党要统一，学校里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也要统一，要有一致的意见。这个一致的意见，毛泽东当时讲了四条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而且，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按照这四条来学习，学校里的学生、工作人员统统要到达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办好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毛泽东讲，我们的党校里也有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非无产阶级思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自发性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

党校教育怎样搞好？毛泽东说，在党校中有两种培养教育干部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把人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在

两年之内提高一步。

《毛泽东年谱》还记载了这样的感人一幕，1944年5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即将赴前线的学员讲话时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

团结是我们党的命根子，没有团结就没有一切、更谈不上任何胜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时，专门讲了团结问题。他说，首先是从团结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100万党员出发，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及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作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

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

他接着说，其次要分析。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我们分析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和难过，这是正常的。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也就是我讲过的两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什么叫公道？毛泽东对党校学员说，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这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辩证法最基本的一条叫作矛盾的统一，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比如对的和不对的，不承认这一条，就是不承认辩证法。我们要提倡主动性，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写的决议，把自己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才能办好事。我们党校就提倡这一条。

邓小平关于制度治党的五大思考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用制度治党，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党的建设领域的体现和运用。制度治党将宗旨意识通过制度规范外化于行，树立党纪法规防线，可以使建党成果得以巩固和扩展。邓小平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党的制度建设，对制度治党作了深入思考，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历史镜鉴。

□ 冯 兵

教训与反思：制度治党的必要性

邓小平多次强调制度治党的必要性。“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他痛感制度缺失和制度失效的严重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回顾党的历史，邓小平指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这也概括实际上强调，纵观党的历史，凡是制度治党坚持的比较好的时期，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取得巨大成功，忽视制度治党的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往往陷入低谷。

质量与体系：制度治党的外部条件

制度治党的前提是高质量制度和制度体系的形成。要用制度建设来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必须首先制定好的制

度，形成全面的制度体系。制度建设不仅仅在于某项或某一些具体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更在于一系列集中反映党的整体意志、符合政党活动规律的制度体系、制度机制的制定和执行。实践表明，制度是一个政党得以组织起来并有效开展活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没有制度就没有政党组织，缺乏规范健全的制度是政党缺乏战斗力与号召力的重要因由。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建设高质量的治党制度。他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认为，全党应努力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并完善一系列与我国政治生活相配套、与国家制度相衔接的治党制度体系。

能上与能下：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必须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邓小平主张把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作为去除封建主义遗毒影响的重要举措。“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针对权力过分集中不受监督的弊端，邓小平认为，只有坚决清除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等弊端，党的领导才能得到真正加强。

领导干部要能上能下。“废除

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他认识到，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制度入手。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要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和干部退休制度。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职务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的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制约与督促：建立和强化党内监督制度

党内监督就是党员之间、党组织和党员之间，依照党章和其他重要党内规范所进行的相互监察、相互督促的活动。党内监督是否有效关系到党的性质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能否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关系到党能否始终保持其先进性。邓小平把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法规和制度体系看成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大会上，他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提出，“党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进行严格的监督”。改革开放后，他多次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邓小平认为，党内监督实质上

是对权力的监督，而对权力监督关键的是要有制度的保证。

团结与统一：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始终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民主和集中是内在统一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

邓小平要求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正确处理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党的各级组织同党中央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党内各种制度中最根本的、带有贯穿性和纲领性的制度。他强调要使好的传统经验条理化、制度化，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于党的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党内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正常化、秩序化、法律化，要建立完备的党内法规和章程，建立党的各方面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制度，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制度、党委会工作制度、组织生活制度、监督制度、干部管理制度。这一思想开创了不搞政治运动，依靠制度治党的党建新路径，有力弥补了党建理论的某些不足，将党的制度建设实践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林伯渠1886年出生于湖南临澧，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1945年3月林伯渠60寿辰之际，中共中央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祝词，称赞他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革命老战士”。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任红军总供给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马，可他却很少骑，总是把文件和警卫的背包驮在马背上，自己则拄着一根从瑞金带来的棍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步行。警卫员多次劝他上马，他都风趣地说：“大家都用两条腿走，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腿’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条腿呢？”

每次行军时，他总是提着一盏小马灯，站在险隘难行的路口，照着让队伍通过。红军女战士李坚曾用山歌这样唱道：

年过半百老英雄，
又当部长又当兵。
山高水深何所惧，
手举马灯照人行。

进入草地后的一天深夜，林伯渠从卫生队回来，看见警卫员小黄正往水瓶里灌开水。他命令道：“灌满水后把它送到卫生队去，伤病员比我更需要它，别再把暖瓶拿回来了。”小黄知道这暖瓶的来历，那是红军打遵义时缴获的，之后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长征途中，林伯渠泡干粮、吃药都得靠它。特别是进入草地后，它更是立了大功。想着这些，小黄的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小黄舍不得，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他想，部长头发都白了，还坚持同大家一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送给伤病员，品格多么高尚啊……

1944年春节，延安边区政府门前的墙报吸引了很多人，一个高个子外国记者挤在人群里，认真地抄写一篇《我的生产节约计划》。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写，并用诗的形式记下来，这位外国记者是慕名而来的。

原来，林伯渠制订的生产节约计划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毛泽东看到后也十分赞赏，并回信说：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

那位外国记者深受这篇生产节约计划的感动，就怀着好奇、敬仰的心情，采访了林伯渠。

他来到林伯渠的住处，只见窑洞里只有一盘炕，炕上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一张破旧的小方桌，桌边放着几把

毛泽东对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期望是什么呢？他说，党校出去的同志，都采取一致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且到处宣传，对你前后左右的人宣传，到哪里就跟哪里的人宣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

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有了现在这样一套正确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准备在中国胜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学习和研究，会不会达到胜利呢？会达到胜利的！

共产党人既要像“柳树”，也要像“松树”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学员讲：国民党反共，抗战不积极，贪污腐化，没有一点希望了。政治、军事、经济都没有希望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

为此，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既要像“柳树”，也要像“松树”。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最后对中央党校学员说：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困难。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我讲的就是一个原则，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解放！

『三条腿』的供给部长
林伯渠：
□ 王建柱

半旧的椅子。此时，林伯渠坐在椅子上，埋头缝补着一条旧裤子。他笑着对记者说：“中国有句俗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呢！”

外国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种的菜地，于是林伯渠便拄着根手杖，带他来到了延河边的一块滩地上。

外国记者蹲下身来，抚弄着地里嫩绿的秧苗，赞不绝口：“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不仅发动群众干，还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是了不起啊！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告诉全世界。”他紧紧地握住林伯渠的手说：“谢谢主席先生！我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林伯渠是“延安五老”中去世最早的一个人。1960年5月，他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却依然埋头工作。5月29日，因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74岁的林伯渠便与世长辞了。邓小平在悼词中说：“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